现代篇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南京经济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 年的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突破长江天堑，于 4 月 23 日解放了南京。这不仅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政权把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已经结束，而且意味着古老的南京获得了新生。在国民党统治下饱受物价飞涨、经济衰败之苦的南京人民，终于盼来了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们兴高采烈，欢庆解放，热切希望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然而，从全国来说，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西南、华南等地区苟延残喘，企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就南京而言，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连年内战的影响，留下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社会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

第一节　畸形的官僚消费型经济结构

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风光旖旎的古城。“十里秦淮，六朝金粉”，商贾云集，贸易繁盛，机杼声声，云锦竞秀。在国民党统治南京的 20 多年中，这座城市完全变成了一座臃肿庞大的官僚消费型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市。自国民党 1927 年建都南京后，南京人口由 36 万增至抗战前的百万余,抗战时期曾减少至 60 万,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还都后,人口骤增一倍以上，这完全是由于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及其附属的寄生消费人口的增加。据 1948 年 6 月统计,南京市人口约 123 万,其中国民党政府官吏和公教人员 11 万,警察、宪兵、特务 2 万多,他们的眷属 17 万,专为他们服务的茶房、厨师、娘姨、仆役 9 万,无业和失业者 33 万,这类消费人口总计超过 70 万，而真正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工人约为 9 万余人、农民 7 万余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占 1/10 强。

南京成为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完全是靠国民党反动派特种消费支持起来的。由于人口多，而本地生产能力低，一方面吃、穿、用、住、行很多方面的生活资料要靠农村和其他城市乃至外国运来，另一方面,这种状况又刺激了米粮业、建筑业、运输业、搬运业、百货服装等行业的发展，南京当时有米粮业 850 家（有碾米机器的 250 家),面粉业 240 多家,食油业 140 家，食盐业运商 1000 余家、销商 300 余家。为官僚资产阶级盖公馆别墅的各类营造厂最多时竟有 1000家，随建筑业而兴起的砖瓦厂有 54 家,拥有工人 18000 多人，人力车业 3200 家，职工人数 6000 人，三轮车业 800 家，职工人数 3000 人。与此同时，一些为满足统治阶级基本生活的公用事业初具规模,自来水厂有职员 103 人,工人 309 人,月供水 140000 吨;电厂有职员 279 人,工人 765 人,月供电 570 万千瓦时。为了满足统治阶级享乐的需要，许多商业服务业迅速发展，恶性膨胀。据 1949 年 10 月统计,当时全市的商业 19260 户，占全部工商企业的 90%,从业人员超过 30 万。酒楼茶肆林立,舞厅妓院丛生,解放初,南京仅浴堂业就有 1000 家,酒楼 192 家,百货店 594 家,绸布店 238 家。如此庞大的商业主要是为国民党官僚及其家属服务的，与工农业生产和广大市民生活有关的只占 25% 左右。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 22 年中，南京的生产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摧残,民族工业大多设备简陋,规模很小,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解放前南京的大小工厂最多时只有 888 家,其中,使用动力、工人在 30 人以

上者仅 36 家,占总厂数的 4%,其余 2/3 以上是手工作坊。到南京解放时，存有机器工厂 564 家，真正的产业工人只有 2 万人左右,所有机器多为旧的，或七拼八凑的，使用最多的机器为碾米机 127 部，织布机 1073 台,其中大多数是木机 鉛印机 149 架，脚踏印刷机 443 架 洛种车床不到 300 架。资金 1000 万元（旧币）以上者不过 40 家左右,1 亿元以上者不足 10 家，也多属于沪锡厂商分设的机构，经营重点不在南京。本地工业资金极其贫乏，技术水平也很落后，很多厂以学徒代职工，因而产品质量不高，无法与上海、无锡等城市竞争。只有少数企业规模较大，其中，永利公司铔厂具有年产硫酸铔 36000 吨、铔液 7600 吨、硫酸 25000 吨、硝酸 3600 吨、硝铔 3600 吨的能力，号称“远东第一大厂”。龙潭水泥厂生产的泰山牌水泥，年产 12 万吨。有恒面粉厂每月生产面粉最高产量 30 万包,麸皮 48000 包,但这些企业到了解放前夕，大多被挤压得奄奄一息，永利铔厂几乎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吞并；其他存在的工商业也都是元气大伤，占有重要地位的织缎业，1927 年拥有 8000 台织缎机、2 万余工人,1949 年解放前夕已衰落到仅有织缎机 150 台、工人不满 200 人了。原属资源委员会系统各厂，加上军工企业，到解放时，只有 38 家,且多半属装配性质，重要的原材料和技术资料主要依赖进口，如无线电厂不可缺少的各种真空管，电照厂的钨丝、铜丝、镍丝，化工厂所需的氯化苯及各种机器的配件零件，几乎都要从美国进口，一旦与美国贸易出现问题，生产就要受到很大影响。而且，这些企业与南京的其他企业生产经营联系很少，不能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生产体系。

第二节　百业凋敝，满目疮痍

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借着‘还都”的机会,畸形繁荣过一阵子。人口陡增,消费倍长,商店较多,工业发展。但是好景不长，国民党政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不顾，在美国的

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到南京解放时，昔日的繁华都市已成了昨日黄花,风光不再,百业凋弊,满目疮痍。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是：

一、南京经济缺乏坚实基础

南京虽是水陆交通要道，但工业基础薄弱，商业东有上海、无锡，西有芜湖，北有蚌埠，非货物贸易集散地点，历史上就是一个消费城市，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使畸形消费发展到极点。解放前的南京有 70 多万不从事生产的纯消费人口。这种社会构成，导致了商业的畸形发展。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当时的政府机构和官僚及其家属陆续撤离，南京的商业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解放之初，为官僚及公务员服务的商业如中西服店、木器沙发、绸缎、呢绒、百货、化妆品、皮鞋、洗染、中西餐馆等业,都日趋没落倒闭;日用必需品行业仅能维持现状，但也不景气。

二、连年内战造成的恶果

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需要用大量的金钱来维持。为挽回战场上的颓势，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南京时期“兔子不吃窝边草”,南京的税负较其他地方为轻,但全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不能不影响南京,滥发钞票,通货膨胀,财政困难,资金短缺，不仅使中下层人民生活状况恶化，就连一般私营企业也不堪重负,尤其是反动派‘八·一九’限价后,正当工商业遭受极大摧残,资本亏蚀至少是 1/3,大半是亏蚀一半,甚至 2/3。很多厂商只得歇业倒闭。勉强维持的，也大多因运输中断，原料不足，无法开足马力生产,或因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产品无销路,只得削减产量。如永利铔厂，在抗战胜利后，硫酸铔的产量曾达到每日 150 吨，内战爆发后，农村经济衰落，金融紊乱，工业萎缩，该厂的日产量降到百吨以内，到解放前几个月，生产完全停工。有恒面粉厂原日产面粉 8000 包,临解放时日产仅 200 包，建国前夕也因原料来源不足只恢复到日

产 2000 包。水泥工业历史上最高年产量（1934 年)是 14.23 万吨，而 1949 年仅生产 3.1 万吨。就全市而言，解放之初的 1949 年 5 月，有 80% 的企业停工。当时南京的电厂具有三万千瓦的发电能力，但实际用电量只有一万多千瓦，这种电力过剩，并不是南京的电力工业十分发达的标志，而是当时南京经济萧条的一个明证。

三、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

南京作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聚集了一大批达官显贵，他们只顾自己的私利，明争暗斗，营私舞弊，用搜刮来的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根本不管经济的长远发展。而用来点缀门面的官办工业部门，由于官员们把工厂当成衙门办，随意安插亲信，致使非生产人员增多，其工薪支出有的竟占全部成本的 57% ,经营极不合理,以致成本高昂，销路滞阻，濒临倒闭。加之国民党政权为争取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给予美国许多特权，甚至以出卖主权换取大量美援。由于美货充斥南京市场，使弱小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纷纷破产倒闭。

四、反动势力进行破坏

“这些反动势力操纵银元投机，拒用人民币，以捣乱市场，致使物价上涨。再加上帝国主义指使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海上进行封锁并轰炸我们，使我对外出入口贸易几乎完全停顿，如马鞍山铁矿及毛庄等厂矿作坊，不能复工。这样一个内外夹击的封锁轰炸，致使我们城乡互助与内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物价波动很大，大大阻碍了城市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①]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厂商资金困难、步履维艰，投资欲望下降，不少厂家干脆歇业观望。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又将南京薄弱的工业加以破坏。如被服厂机器全部被搬走，六〇兵工厂新机器几乎全部搬走，剩下 4/10 的是一般机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将许多可用码头焚烧毁坏，使昔日繁忙的港口显得冷冷清清。

① 1949 年 9 月 6 日《宋任穷在南京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节　庞大的失业无业人口

由于南京是一个消费城市，就业渠道少，失业和无业问题长期困挠着社会。据 1948 年 9 月至 12 月的统计，失业无业人员达 37 万人,到解放前夕,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受战争的影响,铁路、工厂遭到破坏，大批裁员、遣散和解雇，很多公教人员和仆役也加入失业无业行列，加上涌入南京的灾难民、流亡学生和散兵游勇等，使失业无业人口增至 50 万人左右。

南京解放初，百废待兴，要想很快解决原先存在的失业和无业问题是不现实的，而且新的失业者还在源源不断的产生出来，汇成了一支异常庞大的失业大军。这支失业大军的出现，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与南京的特殊环境密切相关。

一、原有的大部分公教人员、消费人口滞留南京

南京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接管了这座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达 22 年之久的城市,从 1949 年 5 月 1 日起，接管的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大小机关共计 923 个,接收各类员工 56148 人,对其中的 41036 人给予留用。到了 1949 年 7 月下旬，全市各级机关开展了精简节约整编运动,留用员工被精简了 1 万余人，这些人除一部分被动员还乡生产或自谋生路外，另一部分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仍然留在南京，汇入了失业无业的队伍。除此之外，人民政权还面临着如何解决国民党仓促逃跑前被遣散的数以万计的公教人员及其眷属再就业的难题。早在 1948 年 12 月国民党的南京市政府就决定遣散部分职员及其眷属，这些被遣散的人员本应早就离开南京，但他们或因战争影响，交通中断,欲回乡而不得 或因久居南京,长期脱离生产,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况且原籍已无建家立业的基础,欲回乡而不能,于是滞留南京,靠典当度日。南京解放之初，绝大多数行业都不景气，唯典当业和拍卖

行兴旺，就与此等人员的状况大有关系。

二、经济萧条带来失业人数增加

由于百业凋敝，经济不景气，业主为减少损失，首选的办法就是裁员，以致造成大量的工人、店员失业。一些原来比较兴盛的行业萎缩，也带来失业的增加。例如解放前主要为国民党官僚及其家属提供的特殊消费品和迷信品，随着这些服务对象走的走、逃的逃，剩下的也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消费需求必然大减，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势必使这些行业的很多人无事可做，陷入失业窘境。

三、社会的巨大变迁、经济环境的改变导致结构性失业

比如搬运业，解放前消费人口庞大，粮食货物集散量多，搬运业生意很好，收入一般优于技术工人，每人每日收入达三至五斗米，生意差的亦有一斗多。解放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一是消费人口减少，商业萧条，货物集散大不如前，而且贸易总公司、部队自运粮食；二是南京无甚工业品交换，外商货物多直接销往沪锡；三是铁路联运畅通,转栈减少,许多粮行机坊移至城内,由营业汽车运达 四是粮食实行过磅计量，东南城区斛业工人被淘汰。① 一些在车船码头为来往旅客搬运行李的搬运工人，在国民党逃跑的时候，业务曾火爆了一阵子，现因时过境迁而生意清淡，多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再比如，解放前营造业畸形发展，建筑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一半，现营造业随国民党的撤离日趋没落，建筑工人大批失业。此外，像舞厅、酒吧、妓院这些特殊行业，原先是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服务的，与新社会的生活格格不入，取缔这些行业是非常必要的。解放时的南京,光是妓女就有 3000 余人,这些人缺乏正当的谋生本领,尽管从长远看要为这些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员找出路，但在解放初至建国前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解决他们的重新就业问题难度是相当大

① 《目前失业工人情况的初步调查》，《南京通讯》第 10 期（1950 年 2 月 25 日）。

的。

四、受战争环境影响逃来南京的无业失业人口大为增加

一是有些先解放的地区，地主携带浮财逃来南京，以躲避土改斗争。二是自战场上溃退到南京的国民党官兵有 3 万多人，有些中下级军官还带着眷属。这些散兵游勇并无一技之长，失业在所难免。三是自 1948 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大反攻开始后，国民党当局软硬兼施，逼着河南大学、山东医学院、江苏教育学院等几十所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南迁”，结果至杭州后被国民党抛弃，只得徒步北返，到达南京时已濒临绝境，使无业失业人员又增加不少。仅从 1949 年 5 月至 8 月，由南京市军管会出资遣返流亡学生、教员及其眷属就有 12696 人。

五、频繁的自然灾害使无业人口进一步增加

1949 年华东地区水、旱、虫、雹灾害相继发生，国民党只顾打内战，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周围广大地区的灾民源源不断涌入南京。据 1949 年 9 至 12 月份统计，由江北来的过境灾民平均每月约 5000 人左右。[①] 这些人生活无着，多以乞讨度日。

此外，南京城原来还有盗匪、小偷 4000 余人。[②]

如此庞杂的几十万失业无业人口，给新生的革命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南京市委在给中共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中写到：“这些人当中，解放前就没有办法生活者，希望我们救济；解放前为非作歹以谋生活者，不满意我们法令限制和发动群众；解放后失业者，不满我们的措施；过去依靠官僚享乐而生活者，转入投机活动；现在采取以工代赈、修筑江河堤岸、学校大量收容训练、组织合作社等办法，来解

① 南京市民政局编《南京社会福利工作的十年(1949—1959)》。

② 南京市档案馆藏《市委关于治安工作向中央及华东局之报告》(1949 年 12 月 7 日)

决一部分愿意劳动、愿意进步的人的生活，但为数极少。这样庞大的、生活上没有保证的人员放在南京，在治安工作上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整个工作中也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常为这些而焦虑。’①

综上所述，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旧中国留给南京的是一个经济崩溃、结构畸形、百业凋敝、失业严重、民不聊生的烂摊子。解放后，南京人民在党和军管会的领导下，立即着手重整河山，恢复生产。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从 1949 年 5 月 2 日起，以人民币 1 元兑金圆券 25000 元的比率，收兑国民党时期发行的金圆券。同时，市贸易总公司成立，开始发挥公有经济的作用。5 月 17 日，中共南京市委、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召开工商界代表会议，阐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纲领，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6 月 5 日，江南汽车公司恢复营业，6 月 16 日南京电照厂等 9 家大工厂复工。疏散人口、减少失业的工作也已着手进行。1949 年 9 月 5 日至 9 日，南京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制定了建设新南京的方针和当前的任务，全市人民满怀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一个百孔千疮的旧南京改造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新城市。

①南京市档案馆藏《市委关于治安工作向中央及华东局之报告》（1949 年 12 月 7 日）

第二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南京经济

南京在 1949 年 4 月 23 日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同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年艰苦奋斗，终于把原来为官僚买办服务的畸形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适合广大人民需要的生产城市，原来衰败不堪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城市经济的恢复和整治

一、正确规定改造旧南京的目标任务

南京解放的时候，正值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不久。在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做的重要报告，阐明了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由城市领导农村，要求全党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就要把眼睛盯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将城市的生产事业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的。’① 根据中央的这个指导方针，如果不对南京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加以彻底改造，就难以担负起领导农村的重任，其自身也是难有发展前途的。因此，改造旧南京，建设新南京，就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摆在了党和人民面前。

南京解放后不久，市委、市政府就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结合实际，提出了改造南京的目标任务。1949 年 5 月，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在工商业界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南京是反动统治的中心，是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任务就在生产”；“恢复与发展生产，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② 同年 9 月在南京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代表中共南京市委，就建设新南京的方针做了报告，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把过去畸形发展的旧南京，改造成为真正健全繁荣的新南京”。③ 并且围绕着这个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及‘四面八方’的政策，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恢复、维持、改造生产是当时的工作方针‘迅速接管、初步恢复和大规模发展是衔接有序的三个工作步骤。而当务之急的任务就是做好对官僚买办资产的接收，以掌握经济命脉，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二、对官僚买办资本的接收

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建国初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步骤。当解放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把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与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一并作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1949 年 4 月 25 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明确规定“：凡属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28 页。

②④ 南京市档案馆藏《工商业界座谈会记录》（1949 年 5 月 18 日）。

③南京市档案馆藏《宋任穷同志在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因此，南京一解放，就抽调了军队干部、老解放区工作人员和南京地下党员共 3600 人展开了对官僚买办资产的接收工作，大致从 1949 年 5 月 1 日开始，到 5 月 30 日基本结束。

由于南京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庞杂的军政、文教机关同官僚资本企业交织在一起，其中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工矿事业机构，下设有钢铁、有色金属、机械、电力、石油、化工、造纸等一系列工业部门，而有的企业则隶属国民党的交通部、国防部……。因此，接收官僚资产是同接管国民党的军政、文教机关一并进行的。为确保官僚资本能真正回到人民手中，南京市军管会于 1949 年 5 月发布《关于保护工商业、防止官僚资本隐匿逃避之训令》，明确规定：“各银行钱庄须将股权分别官股、‘四大家族’及战犯股本向本会金融贸易部报告并具结”，并“须将存款户中属于伪政府机关存款、‘四大家族’及战犯存款列表送本会金融贸易部审查，如有隐瞒匿报情事，查明以后，除负责偿还外，并受处分”。①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已接收的单位共 707 个；其中原属伪南京市系统的 406 个，属伪中央系统的 301 个。在此 707 个单位中，大小工矿 38 所（如华中矿务局、马鞍山矿场、中央电照厂、中央电瓷公司、皖南电厂、首都电厂、中央无线电公司南京厂、中央有线电公司、农业机械公司、长江碾米厂、中央机械公司南京厂、中央化工厂等），银行 23 家、农场 9 个。接收的主要物资为银元 38 万元、黄金 635 两、美钞 3800 元、各种粮食 2795 万斤、汽车 1155 辆（大部分是坏的）、机车 226 辆（有 45 辆待修）、货车皮 1033 辆、客车 414 辆、大小轮船 13 艘、汽油 13045 桶及 19191 加仑、医药器材 2 万箱、农场土地 30 万亩。”② 在这些官僚资产中，除电厂、水厂等公用事业规模较大外，100 人以上的工厂仅 7 家，其余

①南京市档案馆藏《市军管会关于保护工商业、防止官僚资本隐匿逃避之训令》。

② 南京市档案馆藏《市委向中共中央及华东局关于接收工作报告》。

都是几十人的小企业。尽管南京的官僚资产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地位很重要，由于采取了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保留了技术组织和生产系统的完整，对企业原有人员，包括厂长经理在内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律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因而在人民政府的监督下使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正常进行，在此基础上，然后再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既保证了将官僚资产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使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又避免了新旧政权交替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失和混乱，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维护社会治安,安置失业无业人员

南京刚解放时，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治安问题十分严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破坏，兵痞流氓的捣乱，也有因失业无业人口众多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散兵游勇利用手中枪支弹药骚扰百姓；国民党逃跑时从监狱里故意放出的 2000 多名惯盗大肆横行；一些生活无着落的流浪者铤而走险。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人民生活的安定，干扰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市委、市政府在解放之初,就着手展开维护社会治安、安置失业无业人员的工作。

首先，彻底摧毁敌特组织，大力打击反动势力，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解放前，南京的特务组织众多，反动党团活动频繁。解放初，约有 3000 名特务,有计划的潜伏在城区与近郊,进行隐蔽活动,并配有大批电台。[①] 他们千方百计设法打入革命阵营，利用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开展破坏活动；组织分散的或小股的特务武装，与土匪结合，进行打家劫舍，袭击我地方基层政府，扰乱社会治安；利用部分商人和失业失学人员对我不满情绪，进行造谣诽谤；制造伪币并鼓动投机来

①南京市档案馆藏《市委关于治安工作向中共中央及华东局之报告》（1949 年 12 月 7 日）。

破坏金融，与我在经济上作斗争。[①] 针对这种情况，市军管会于 1949 年 5 月 31 日发布《关于收缴武器、电台之布告》，同年 6 月 2 日又发布《关于解散敌特组织之布告》和《关于解散反动组织之布告》，采取自首登记、宣传攻势和组织侦察三管齐下的措施，收缴了大批武器，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打击了敌特的嚣张气焰，一批特务和反动党团分子慑于我强大威力，走上了自首的道路。与此同时，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打击刑事犯罪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至 1950 年 7 月，在发生的 16175 件刑事案件中，共破获 14055 件，占 86.8%。管制小偷 1400 人，收容散兵游勇 8706 人。[②] 通过这些工作，使社会治安获得了很大的改善，社会秩序逐步趋于稳定，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认真落实政策，积极安置失业人员，解决旧政权遗留问题。国民党政权在南京留下的各类员工近 6 万人，根据中央接管城市的政策，采取了“一律包下来”的政策，分别通过留用、介绍学习、协助转业、资助还乡等办法，使这批人各得其所。凡是有一技之长、愿意为人民服务的，都尽可能录用。对一时无适当工作的，按“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精神来解决。经过三次集中处理，在原国民党政府的 56148 名员工中，有 37600 人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其余 18500 人也分别得到了妥善安置。另外，还对约 1.5 万名失业知识分子进行登记，帮助他们联系工作，协助外地用人单位来南京招聘人才，为失业知识分子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第三，疏散城市人口，减轻社会压力，为改造南京创造条件。旧南京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非生产性人口众多，失业问题严重。以南京解放初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无法养活现有的 120 多万人的。如此庞大的人口该怎么办？市委、市政府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

① 南京市档案馆藏《市委关于治安工作向中共中央及华东局之报告》（1949 年 12 月 7 日）。

② 柯庆施《一年来的回顾》（1950 年 10 月）。

深入调查,联系实际,确立了“以疏散为主,临时救济为辅,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自救”的工作方针。在1949年9月召开的南京市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疏散人口为当前急务”的提案,决定成立“疏散人口委员会”以开展大规模的疏散人口工作。在同年12月召开的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加强治安处理难民、生产节约防备春荒”的决议,会后成立了“处理难民委员会”,组织各界人士,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动员,将灾区难民、国民党流散军人、乞丐等一切可能回乡生产的无业人员疏散回乡生产,并通过义卖、义演、捐款、收购等社会互助的方法,解决回乡人员在偿还债务、处理房屋家具等方面的困难,对实在不能解决的困难,政府给予帮助。仅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止,政府就拨出疏散费用78717万元,支付或垫付生产资金2.93亿元,发救济粮17万斤。[①] 南京市政府还专门派人去回乡人员的家乡,与当地政府联系,妥善安排回乡人员以后的生产和生活。疏散人口工作,经历了1949年底、1950年5—6月、1951年1—5月三次高潮。从1949年6月起至1952年12月止,全市共疏散回乡人员332748人,其中灾难民占55.3%,城市贫民占21.7%失业人员占4.8%,散兵游勇占16.1%,游民占1.1%,共他占1%。[②]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大规模的疏散人口工作,减轻了南京市的社会经济负担,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把南京从一个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转变为新兴的生产城市创造了条件。

第四,开展生产自救,度过暂时困难,解决失业问题。在大规模的开展疏散人口工作的时候,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对一些农村里无地可种、无房可住、无亲可投靠的失业半失业及无业者,人民政府及时组织他们从事手工业生产和以工代赈,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在1949年12月召开的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① 《南京政报》第7期(1950年4月)。

②南京市民政局编《南京社会福利工作十年(1949—1959)》。

上,代表要求组织起来生产,提出修堤,以工代赈,既可免除水患,又可赈济灾民的建议。市委书记粟裕在报告中肯定了这是“一举多得之良策”。[①] 至此，全市的生产自救工作掀起了高潮。到 1950 年的 11 月底，工赈工程队完成培修堤岸土方工程 121558 方(约合 17 公里长的堤岸)、修筑道路及桥梁 231961 公尺。布履服装合作社已完成军鞋 40 万双，以及其他被服蚊帐等。据统计，当时参加生产自救的共有 201773 人。[②] 通过生产自救，解决了当时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扩大了生产门路，并为市政建设、城市改造做出了贡献。

这样，南京人民仅用了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就解决了国民党无法解决的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甩掉了消费人口庞大的历史包袱，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为以后南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四、调整工商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南京和全国一样，经历了工商业的调整和‘三反”五反’运动。

(一)工商业的初次调整

1950 年春,南京经济突然出现了市场萧条、商品滞销、积压严重的现象,对此,许多私营企业消极经营,有的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解雇职工，关厂歇店，致使工人失业增加，劳资关系紧张。1950 年 1—3 月工业停业 35 户，商业停业 535 户;4—6 月，工业又停业 53 户，商业又歇业 943 户。全市失业半失业工人达 5.2 万人。[③] 之所以出现这种始料不及的状况，其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政府在稳定物价后，群众的抢购心态得到了矫正，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资本家靠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已很难获利,加之紧缩通货,抽紧银根,致使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二是由于社会条件变化，原先一些为剥削阶级奢侈

①南京市档案馆藏《市政府关于工作实施概况的报告》(1950 年 4 月)。

② 《南京简志》第 836 页。

③ 《本市工商业的维持和改造》,1950 年 11 月 13 日《新华日报》。

生活服务的行业如银楼、古玩店、舞厅、高级餐厅等失去了服务对象，必然出现衰落；三是在工作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兼顾不够，在价格政策、原料供给、银行贷款方面做得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税收上也有畸轻畸重的现象。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南京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规定，合理调整工商业，并把它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

调整工商业的工作主要包括三项内容：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中心是调整公私关系。首先是调整工商业关系，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适当照顾私营工商业，压缩部分国营公司机构，为私营工商业让出一些市场；通过银行大量贷款和降低利率的办法，在资金上扶持私营企业生存发展。从 1950 年 5 月起的 5 个月内，人民银行向全市公私企业贷款 384 亿元，其中贷给私营工商业达 332 亿元，占 86.9%，[①] 国家贸易部门也通过委托加工、订货收购等方式，积极扶助私营工业生产。其次是减轻负担，国家在全国大城市中独对南京私营工商业豁免了 1949 年的工商所得税。[②] 第三，调整劳资关系，鉴于这一时期大批工商户歇业、劳资纠纷增多，市政府协调劳资关系，一方面要求资方顾全大局，纠正抽逃资金、消极经营的倾向另一方面，发挥工会的作用，号召广大职工积极克服困难，维持改造生产，南京的工人阶级为此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百货、绸布、粮食等行业的 1000 多家商店职工主动减薪，最多减七成，最少减一成。为了使劳资双方同舟共济，市总工会还在部分企业中建立劳资协调会议，双方签订合同，明确双方各自在生产管理中的权利和义务。对较大的劳资纠纷案件，由市总工会和劳动局进行调整处理。由于措施得当，劳资纠纷大为减少。据市劳动局统计，1950 年 4—8 月，该局受理劳资纠纷 984 起，平均每月 200 起，调整劳资关系后，9 月份

① 《本市工商业的维持和改造》1950 年 11 月 13 日《新华日报》。

②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江苏卷南京分册)第 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